

论李益边塞诗中建功情怀

文 / 杨坤

李益(724~829),字君虞,祖籍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自九世祖李承起,迁居洛阳,世为山东大族,李益生于盛时,长于乱世。但倾心苦读,博览群书,大历四年于东都洛阳登进士第,六年帝制科讽谏主文释褐,授郑县主簿。但如同大多数唐代文人,科举之路并未给命运带来显著转机,于大历九年辞职,愤而从军,走上“功名只向马上取”的道路。先后为凤翔陇右节度使、朔方节度使、幽州节度使、振武节度使、幽州节度使幕府僚属。文宗太和元年以礼部尚书致仕,太和三年前后卒。有《李益集》《李君虞集》传世,今存诗一百四十余首,《全唐诗》编为二卷。

李益生于玄宗天宝七载戊子(748)。“君虞长始八岁,燕戎乱华。”[1]卒于文宗太和初“太和初,以礼部尚书致仕,卒。”[2]李益跨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九朝,见证了唐王朝由极盛到破败的百年沧桑。李益也是有唐一代出塞最久的边塞诗人,“出身二十年,三受未秩;从事十八载,五在兵间。”[3]在外时间久,因此也是创作边塞诗最多的边塞诗人。显存其边塞诗多达五十多首,是其他创作边塞诗歌的世人所不能与之相比的。李益现存的边塞诗内容丰富多样,全面介绍了将士出塞生活的每一细节,我们由此可以读到大唐生活的方方面面。

簪扫公门。”注释:“我喜”二句:是说自幼即仰慕袁枚之才。上句用司马相如慕蔺典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字长卿,小名犬子,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慕蔺相如之为人,改名相如。”后世以慕蔺指倾慕名贤。(同上,页202)

按:从诗意看,“司马”代指袁枚,与司马相如慕蔺事无关。明清修史之职归之翰林院,故俗称翰林为太史。袁枚曾做过翰林院庶吉士,诗题称袁枚为太史,所以此处“司马”当是太史公司马迁。

(十八)、《清明日偕贾稻孙、顾文子、丁秀岩登白垆山》:“凭陵极雄飞。”注释:雄飞,雄气英发。(同上,页204-205)

按:此诗压仄声“未”韵,一韵到底。“飞”字处是韵脚,不可能是平声。检《两当轩集》卷一〇,页253:“飞”为“恣”之误。雄恣:威武肆意。

(十九)、《渡河》:“怀中有白璧,径渡不须猜。”注释:“怀”二句:用卞和献璞典事。(同上,页225-226)

按:注释误。此二句语本《博物志》:“澹台子羽渡河,赍千金之璧于河。河伯欲之,至阳侯波起,两蛟夹船。子羽左摩璧,右操剑,击蛟皆死。既渡,三投璧于河,河伯跃而归之,子羽毁而去。”

(二十)、《马上逢雁》:“我方北去三千里,尔是南来第几峰?来岁北归如有意,深闺书札恐烦君。”注释:第几峰:衡山南峰有回雁峰,相传雁南来北去以衡山为界,衡山有七十二峰,故云。(同上,页226)

按:“峰”属平水韵“冬”韵,“君”属“文”韵,显然不能通压。从诗意看,“尔”指雁,则“峰”字必误。检《两当轩集》卷一一,页283:“峰”为“群”之误。“群”与“君”同属文韵。注释因误植而误解。

(二十一)、《东阿道中逢汪剑潭》:“裘马虽争入蜀都,容颜略似游梁倦。”注释:蜀都:古代蜀国的都城,在今四川成都。(同上,页228-229)

按:注释误。这两句为对仗句。“入蜀”与“游梁”对仗,所以“蜀”和“都”要断开,“都”有美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

(二十二)、《高唐》:“草没龙头应有冢。”注释:龙头:龙头士,杰出的人物。(同上,页231)

按:注释不确。“龙头”指华歆,歆为高唐人。《三国志·华歆传》注引《魏略》:“歆与北海邴原、管宁俱游学,三人相善,时人号三人为‘一龙’,歆为龙头,原为龙腹,宁为龙尾。”

(二十三)、《丙申除夕》:“银筋怕翻商陆火。”(同上,页245)

按:“筋”字平仄和意思都不对。检《两当轩集》卷一二,页309:“筋”为“筋”之误。

(二十四)、《偶游僧舍,见有题恶诗于壁者,姓名与予同,戏作》:“生平未赋潇湘景,厕鬼无烦为不平。”注释:厕鬼:厕名鬼录,指死后。(同上,页258-259)

按:注释误。厕鬼即厕所之鬼,详见柳宗元《李赤传》。

(二十五)、《张鹤柴招集赋得寒夜四声》其二:“霜重声逾肥。”注释:肥,形容声音厚重。(同上,页271)

按:此句为五律的第五句,不可能是平声收尾,而“肥”是平声。检《两当轩集》卷一四,页339:“肥”为“脆”之误,“脆”同脆。

(二十六)、《与稚存话旧》其一:“纵使身荣谁共荣。”(同上,页278)

按:此句是七律的第三句,不可能是平声收尾,而“荣”是平声。检《两当轩集》卷一四,页346:此句第二个“荣”为“乐”之误。

(二十七)、《将之关中留别吴二春田》其一:“百日饮无事酒。”(同上,页309)

按:“无事酒”失注,此处用犀首事。《史记·张仪列传》:“陈轸曰:‘公何好饮也?’犀首曰:‘无事也。’”苏轼《送王伯敦守虢》:“惟有使君千里来,欲饮三堂无事酒。”

(二十八)、《初夏命仆刈阶草》:“所以下流耻,君子慎交接。”注释:下流耻:下流之辈不知羞耻。(同上,页317-319)

按:注释误。“下流耻”出《论语·子张》:“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朱熹《论语集注》解释说:“下流,地形卑下之处,众流之所归。喻人身有污贱之实,亦恶名之所聚也。”

(刘雄:(1977-),男,四川自贡人,浙江大学古籍所07级博士研究生,绵阳师范学院文学与对外汉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化。)

《边思》中“腰垂锦带佩吴钩，走马曾防玉塞秋。莫笑关西将家子，只将诗思入凉州。”李益这个抱着对时代美好希望却又似乎被时代抛弃的落寞关西将家子，感慨着那次防御门关之秋的景象。再强大的军队阵容，再浩瀚的军队气势，似乎也掩不住中晚唐逐渐沉沦的光景。安史之乱乱了唐朝兴盛的景象，乱了军心，乱了民意，却兴盛了吐蕃的气势。挫败中的唐王朝不得不在金秋时节抽调大量兵力保卫京都，“高秋肥马，吐蕃数寇，唐岁调关东之兵屯京西以防之，谓之防秋。”[4]破败的唐王朝，仍旧是利益为代表的少数有为青年志士心中的希望，看尽大唐的利益心中早已失了悲哀，渴望建功立业有一番作为的他将自己的豪情壮志汇入诗中，虽是“防秋”，豪壮气象依旧。故俞陛云称赞此诗“在塞下诗中，别开格调。”[5]

又如《塞下曲》中“伏波惟愿裹尸还，定远何须生入关。莫遣只轮归海窟，仍留一箭射天山。”此诗连用三个典故，伏波将军马援曾言“为保卫国家，宁愿马革裹尸而归”；定远侯班超为国家安定，尚不惧死；征西将军薛仁贵三箭定天山，使得敌人下马臣服。李益的真性情在此诗中暴露无遗，用几个典故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拯救国家的美好意愿深刻画在诗中，慷慨激昂，目空万物。李益就是这样，不拘泥于现状，不颓废于唐王朝的哀伤耻辱中。怀着对敌人斩尽杀绝的高昂志气，利益写下这首气势震天的《塞下曲》。

《夜发军中》突如其来地夜战“边马枥上惊，雄剑匣中鸣。半夜军书至，匈奴寇六城。中坚分暗阵，太乙起神兵。出没风云合，苍黄豺虎争。今日边庭战，缘赏不缘名。”战事中多是夜晚来袭，沉沉夜幕，偶尔孤鸣，正是军队稍有倦怠之时。此时匈奴大举进攻，然而训练有素的边疆军人，从容有序，在紧张的战事中淡定自信，英勇抗敌。只是诗尾一句“缘赏不缘名”流露出极为现实的思想，不再是盛唐时期的浪漫情怀，也不再有着那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抹去了天真与单纯，更多的是时代赋予他的现实与理性。

此时的李益，破别而不加隐瞒的建功思想充斥着他的头脑。这种建功思想的目的甚者也在他的送别诗中有所体现，如《送柳判官赴振武》“边庭汉仪重，旌甲似云中。虏地山川壮，单于鼓角雄。关寒塞榆落，月白胡天风。君逐嫖姚将，麒麟有战功。”此诗少了败落的大唐给予诗人的颓败心情，多了些对友人的勉励，而诗末又是借勉励友人直抒自己对建功的渴望，慷慨霸气，志气昂扬。

在他的《赴邠宁留别》中他写道“身承汉飞将，束发即言兵。侠少何相问，从来事不平。黄云断朔吹，白雪拥沙城。幸应边书募，横戈会取名。”李益身承汉飞将，这种出身本就给了李益渴望建功的远大志向。在大唐诗中，建功和任侠往往密不可分，有了强烈的建功意识又会促使诗人任侠意识的高涨，李益只为追求自我，实现自我，“横戈会取名”。侠气在一个侧面不断击打着李益追求功名的内心，李益便将这种心情无限放大，“侠气五都少，矜功六郡良”。李益深谙“虎父无犬子”的道理，更何况他并不愿成为那孱弱的犬子，他的这种豪情壮志弥漫在他整体的诗歌创作中。尽显大气。许学夷曾表示“李益在大历以后而其诗气格有类盛唐者，乃是其气质不同，非有意复古。”[6]

“从先唐边塞的创作看，建功、任侠、报恩主题往往三位一体、密切联系，但李益的边塞诗除表现建功意识及豪侠义气外，似乎更强调报恩思想。”[7]建功的目的便是报恩，当一个人享受过国家恩泽，又阅尽其盛衰，他内心怎能不怀有浓浓的爱国情怀呢？况李益出身虎门，“出身二十年，三受末秩；从事十八载，五在兵间”，侠少豪情愈重，渴望以建功来报效大唐，如《再赴渭北使府留别》“结发逐鸣镝，连兵追谷蠡。山川搜伏虏，铠甲被重犀。故府旌旗在，新军羽校齐。报恩身未死，识路马还嘶。列峰高峰举，当营太白低。平戎七尺剑，封检一丸泥。截海取蒲类，跑泉饮鸕鹚。汉庭中选重，更事五原西。”李益自身本具有的侠少气质使得他“结发逐鸣镝”几十年的军旅生活又使得他望以建功立业来报效国家“报恩身未死，识路马还嘶”，他

语气悲壮，深沉，为报国而献身的思想横贯全诗，又如他的《轻薄篇》“少年但饮莫相问，此中报仇亦报恩。”这都是他渴望建功与报效并举的直言感发。

李益渴望建功，所以他“从事十八载，五在兵间”。尽管同大多数数行走任在兵间的臣子一样，对朝廷与时代有着诸多不满，但李益的出身何其天生的诗人气质使他对眼前这虽荒芜的黄沙有着无限的憧憬，这不能不说是李益心中对建功的希望起了极大的作用。“他所描写的边塞军人生活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无论情调如何，都能让读者强烈感受到诗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真善美的追求。”[8]一个人只有真正的热衷于某一事物才会对这一事物如此关注，而这种关注背后一定又有一个强大的动力驱使他。恰如李益对军旅生活的观察如此细致入微，表现了他对军旅生活的热爱，这种热爱又是源于他渴望建功的内心。如《暖川》“胡风冻合鹳鹑泉，牧马千群逐暖川。塞外征行无尽日，年年移帐雪中天。”诗人长期驻守大唐边疆，日日与匈奴打交道，掠过战争，大家不过都是一个个渴望太平盛世的小老百姓罢了，“牧马千群逐暖川”，北方的游牧生活倒也安逸，无奈塞外征行，一去便是无尽日，李益对塞外民生兴趣的背后实则也流露出对和平盛世的向往，而达到和平只有平定战乱，这便又回到建功立业报效祖国的主题上。诚然，李益对建功立业如此执着的目的亦是有着富足的生活，波澜不惊的日子，他的这种心态随着他质朴的笔触注入诗中。

事实上，李益终究是凡人，终究也只是一个经历了太多世事的朴素诗人罢了，他又怎么可能失了那种大时代背景所赋予的悲情主义，他不过是将这种悲愤融入诗歌之中，昂扬起斗志，激励人心，用自己特有的写诗的方式表自己决心，诉说渴望建功立业的迫切心境，同时亦勉励他人。

的确，李益是凡人，一句“缘赏不缘名”透出极为简单极为现实的单纯目的，在他的《五城道中》中，他写道“来远赏不行，锋交勋乃茂。未知朔方道，何年罢兵赋。”直言朝廷黑暗，指责其有功不赏，这样的结果，谁愿徒劳卖命。李益仅仅只是这样一类人的一个代表而已，渴望建功立业而后衣锦还乡，过上富足生活。这是特定时代赋予他们的共同特征。

然而李益却是恨着游牧民族的，恨他们的强大，恨他们的平静生活。因为在他的眼里他只看到了在水深火热中徘徊的大唐人民，同边疆游牧民族的安逸相对比，李益更是对他们恨之入骨。而在边塞时间久了，便也了解了其实人民都是渴望和平安逸的。“燕歌不断塞鸿飞，牧马群嘶边草绿。”这样的生活更加激发了李益渴望有一番作为的信念，有朝一日，莺歌燕舞，那才是利益心中的梦想。

参考文献

- [1] 李益《从军诗序》[A]，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C]，苏州：琴川书屋，1702年。
 - [2] 刘昉等《旧唐书·李益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 [3] 李益《从军诗序》[A]，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李君虞诗集》[C]，苏州：琴川书屋，1702年。
 - [4] 司马光《资治通鉴·代宗纪》[M]《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卷一百二十四。
 - [5] 俞陛云《诗境浅说续编》[M]，《中华大典·文学典》[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 [6] 许学夷《诗源辩体》[M]《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股份有限公司，1986，卷二二。
 - [7] 王应明《李益研究》[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4年。
 - [8] 王应明《李益研究》[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4年。
- （杨坤：女，内蒙呼和浩特人，现就读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中文092班。本文指导教师系文学院教师宫臻祥）